

# 徐志摩和鲁迅的文坛恩怨

**徐志摩**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率直而热情的浪漫主义诗人,他秉承英国绅士的生活方式,追求有小资情调的闲适生活,飞机失事不幸结束了他浓情而感伤的一生。与此相对的是,鲁迅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面旗帜,他长期生活在批判和忧思中,对现实和人性有深刻的洞察,疾病的侵袭让他过早离开了人间。风格迥异的两人在文坛上的交锋虽不多,却折射出现代文学的复杂现场和人性中的矛盾。

## 初次“交锋”:鲁迅反感徐志摩的矫情

徐志摩和鲁迅原本难以出现正面交锋,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是一类人,生活的天地和结识的人群存在很大差异。但在本刊物上,由于各自不同的观点,他们终于有了次不愉快的“相逢”。

1924年12月1日,由周作人、钱玄同和孙伏园创办的《语丝》杂志,刊登了徐志摩翻译波德莱尔诗集《恶之花》中的《死尸》一诗,在译诗之前,有一段徐志摩阐述音乐的文字:“诗的真妙处不在他的字义里,却在他的不可琢磨的音节里;他刺戟着也不是你的皮肤(那本来就太粗太厚!)却是你自己一样不可琢磨的灵魂……我不仅会听有音的乐,我也会听无音的乐(其实也有音就是你听不见)。我直认我是一个干脆的Mystic,为什么不?我深信宇宙的底质,人生的底质,一切有形的事物与无形的思想的底质——只是音乐,绝妙的音乐……无一不是音乐做成的,无一不是音乐。”徐志摩的音乐观充满了泛神论的色彩,阐述说宇宙万物都有自己的节奏,诗歌更是如此。

鲁迅是《语丝》杂志的主要撰稿人,他看了徐志摩的文章后,觉得徐志摩将音乐性描述得如此神秘的地步,有些夸张和扭曲。于是写下了“音乐”?一文,1924年12月15日刊登在《语丝》第5期上,对徐志摩高深莫测的“音乐观”加以调侃。鲁迅的文章说,能在生活中到处听到“绝妙的音乐”的人应该是神经出了问题,产生了幻觉,将其“送进疯人院”也不足为奇。

远在国外的刘半农,收到周作人从国内寄去的《语丝》,先看到徐志摩的高论,不禁生出几许异议,后又读到鲁迅的文章,于是写成《徐志摩先生的耳朵》一文。刘半农在海外学习音韵,对于文字的音乐性话题较敏感,他对徐志摩阐述音乐的文字不敢苟同,风趣地说,如果徐志摩高寿后百年归去,“我刘复幸而尚在,我要请他预先在遗嘱上附添一笔,将两耳送给我解剖研究”。

鲁迅难道真的反感徐志摩阐述音乐的文字吗?以普通人的处理方式而论,一般不会无故讥笑别人的文章,除非文章的作者干扰了自己的清闲。想当年,徐志摩从英国回国后,到处投稿,四处交友,崇尚爱情等等,这些行事作风与鲁迅格格不入。因此,恐怕不是徐志摩故意招惹鲁迅,而是鲁迅不喜欢像徐志摩这样的人,又反感徐志摩的夸张表达,才会去写文章调侃。

至于徐志摩,我们从他后来评价鲁迅文章的文字中,也能看出他对鲁迅态度的微妙变化。徐志摩在主持的《晨报副刊》上刊文《关于下面一束通讯读者们》说:“鲁迅先生的作品,说来大不敬得很,我拜读过很少,就只《呐喊》集里三两篇小说,以及《热风》集里的几页。他平常零星的东西,我即使看也等于白看,没有看进去或没有看懂。”

## 再度结怨:因才女凌叔华的一幅临摹作品

此后,徐志摩接替孙伏园主持《晨报副刊》,又让他与鲁迅发生了不愉快的联系。

《晨报副刊》在1924年底前主要由孙伏园负责编辑。孙伏园是一

位负责的编辑,也有开拓的勇气,鲁迅的《阿Q正传》就是由他编辑后在《晨报副刊》发稿的。但因为新来的学艺部总编辑刘勉己与孙伏园发生冲突,孙伏园辞去在晨报的工作,投奔《京报副刊》而去。

两人发生冲突的原因是什么呢?事件起因是这样的,孙伏园与鲁迅关系甚笃,他将鲁迅的一首新诗《我的失恋》编好排版了,不想在没有接到通知的情况下,被刘勉己撤掉,他知晓情况后当即和刘勉己翻脸并离开。赏识自己才华的编辑加朋友为了自己的文章失了工作,这让鲁迅对《晨报副刊》及与之相关的人产生了不好的印象。

作为《晨报》负责人之一的黄子美,与徐志摩是世交;作为晨报社总编辑的陈博生,是徐志摩留学英国时的朋友。孙伏园走后,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让徐志摩来接替,但此时的徐对此并无兴趣。1925年3月,徐志摩去欧洲前,朋友们还在游说他留下来编辑《晨报副刊》。但他回去再论此事。

1925年9月,徐志摩去上海处理完感情问题后回到北京,陈博生等人再度找上门来。徐志摩招架不住众人的劝说,决定接手《晨报副刊》,每周的期数、每期的容量、文章的内容等都由他自行定夺。

徐志摩在改版后第一期发表的凌叔华小说的后面,写了一句话,说“副刊篇首广告的图案,也是凌叔华女士的”。这句话表述不准确,那幅图是凌叔华临摹别人的作品,并不出自她的创意。10月8日,《京报副刊》刊出署名“重余”的文章《似曾相识的〈晨报副刊〉篇首

图案》,认为凌叔华“剽窃”了英国人比亚兹莱的作品,并批评刊物用人不当,选图不当等等。

徐志摩为澄清事件,将事情经过作了说明,于10月10日见报,表明是他错误的表述造成误解,导致凌叔华担了“罪责”。读者明白了凌叔华“剽窃案”的经过后,也不再追究其过错。此事似乎到此结束了。

但1926年初,陈西滢与鲁迅的一场论战,再次让凌叔华“剽窃”图案一事成为焦点,也让徐志摩和鲁迅间接有了联系。陈西滢与鲁迅的论战,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惹人注目的“战争”,背景当然十分复杂,在此不做讨论。只是此事又涉及到了徐志摩,在此略作交代。事情起源于陈西滢指出鲁迅所作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抄袭了日本学者的观点和文字,鲁迅则认为陈西滢纠缠不是目的,报复才是本意。陈西滢报复他什么呢?鲁迅在《不是信》中说,陈西滢怀疑他揭露了凌叔华“剽窃”比亚兹莱的画,才说鲁迅也“剽窃”了日本学者的文。

风波至此,徐志摩也只有换掉凌叔华临摹的“挥手女郎图”,换上一多画的图案。

**想当年,徐志摩从英国回国后,到处投稿,四处交友,崇尚爱情,行事作风与鲁迅格格不入。因此,恐怕不是徐志摩故意招惹鲁迅,而是鲁迅不喜欢像徐志摩这样的人,又反感徐志摩的夸张表达,才会写文章调侃。**

## 两人恩怨的前因后果

徐志摩人前总是风度翩翩,处事不温不火。对他的这种个性,英国汉学家魏雷曾在文章《我的朋友徐志摩》中说:“徐志摩虽然崇拜拜伦,但为人并没有多少拜伦作风,比如缺少拜伦之愤世嫉俗。”徐志摩不愿树敌,很少做出偏激行为。

徐志摩最初对鲁迅十分友好,他曾在给魏雷的一封信中极力推荐鲁迅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:“我们一个朋友新出一本《小说史略》颇好,我也买一本送给你。”这封信写于1924年2月21日,可见至少在此之前,徐志摩是把鲁迅当作“朋友”的。可就是当时这位“朋友”,后来却成了他文学路上的对立者。

徐志摩率直而热情,敢于冲破旧观念的束缚、追求个人幸福,这是鲁迅性格所缺乏的,也是他的价值观所不认同的。也许正是这些原因导致鲁迅对徐志摩起初反感,经孙伏园离职一事,更怀有芥蒂。

徐志摩与鲁迅二人的婚恋观也是世人喜欢比较和讨论的话题。很多人最不能释怀的是徐志摩对待婚姻的态度,离弃结发之妻张幼仪,追求有夫之妇陆小曼,念念不忘林徽因等,让人产生朝三暮四之感。徐志摩在英国时受到罗素婚恋观的影响,加上他总是循着感性的方向行事,在婚恋问题上,做出了招人非议的感情取舍。而鲁迅在婚姻问题上则遵循了传统礼教。但若论及二人在婚恋问题上孰是孰非,唯一能断定的就是他们两人对待婚姻与爱情的态度是不同的。

在派系林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,徐志摩直率地为人为文,虽招致很多责难和争议,但亦常见他用真诚的态度化解各种矛盾。在徐志摩不幸遇难后,他的朋友纷纷撰文怀念他的真诚和热情,就连鲁迅也一改往日的讽刺口吻,并从报上剪下徐志摩罹难的报道,留作纪念。徐志摩与鲁迅的文坛恩怨业已化为缕缕烟云,消逝在时间的浩淼中,成为颇具雅兴的话题。

熊辉《看历史》

# 谁第一个喊出“毛主席万岁”的口号

**当初**《党史纵览》发表文章《“毛主席万岁”口号背后的众说纷纭》,文中记述“毛主席万岁”这个口号是人民的心声,曾经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伟大领袖的良好祝愿和衷心爱戴。对于谁是第一个喊“毛主席万岁”的这个问题,学界存在几种说法,摘编如下。

## 一说是黄炎培,一说是彭真

曾有报道称,近现代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教育家黄炎培是第一个喊出“毛主席万岁”的人。

1949年3月,黄炎培在中共秘密组织的帮助下,辗转到达北平。当天晚上,刚进北平西郊的毛泽东设宴款待黄等20多位知名民主人士。第二天,毛泽东又单独设晚宴招待黄炎培,两人畅谈时局直到深夜。这是其他人士没有得到的殊荣,黄炎培心潮澎湃。到第三天,时任北平市长叶剑英在国民大戏院开欢迎会时,黄炎培情不自禁地振臂高呼口号:“人民革命万岁!中国共产党万岁!毛主席万岁!”

另一种说法是,根据李雪峰(“文化大革命”初接替彭真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)的回忆,在1966年4月“第二次杭州会议”受到点名批判,知道自己即将下台的彭真,在5

月11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,曾愤愤不平地说:“谁是第一个喊叫‘万岁’的?是我!”由此,证明彭真是第一个喊叫“毛主席万岁”的。学者王春瑜指出:“彭真说他是第一个喊万岁的人,显然是情急之下企图标榜以自保的无谓之举。其实,他不可能提供证据证明他是‘第一个’。”

## 有说是蒋介石第一个喊的

也有文章称,第一个喊出“毛主席万岁”的人是蒋介石。文章说,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,国共两党在重庆进行了为期43天的谈判,期间,蒋介石曾6次高呼“毛主席万岁”。

台湾媒体人张友骅说:“那天,站在台阶前迎接的蒋介石一见毛泽东走进官邸,就连高喊了3遍‘毛主席万岁!’”蒋介石日记里面也说他很佩服毛泽东——以毛泽东那样大的烟瘾,居然在跟他对话

的8个小时里,没有抽一根烟,这个让蒋介石着实“吓了一跳”。

文章最主要的根据是1945年10月9日《大公报》上刊登了这样一篇报道:“……昨晚张(治中)部长又一次大请客,6时3刻,毛泽东、周恩来、王若飞三位先生到了,立刻引起了全体注意……”报道中写道:张部长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了他的“忠实的报告”,就请毛泽东先生发表演说。毛先生从容走近扩音机,首先感谢了各方面。毛先生接着说:“和为贵”,只有和,才能求得双方的一致。“和”是大多数人的愿望。和平、民主、团结、统一、富强,是我们今后的方针,我们要用统一的国家迎接新局面。“可是困难是有的”,毛先生说到这里兴奋极了,“我们不怕困难!各党派不怕困难,中国人民不怕困难!我们要在蒋委员长的领导之下,克服困难,建立独立、自主、民主、统一、富强的新中国!大家一条心,要和平、民主、团结、统一”。(鼓掌)毛先生更郑重声明:“我们的合作,是长期的合作。所有的困难都会打消!”最后毛先生大喊:“新中国万岁!”毛先生在高度的热情中,结束了他的演说。

毛先生的话音一落,蒋委员长就咆哮般地大喊:“毛主席万岁!”连喊3次,回赠毛泽东。文章最后写道:“遗憾的是,没过多久,就发生国共内战,毛泽东的‘和为贵’的愿望都在炮火硝烟中被粉碎了。”

有关蒋介石首喊“毛主席万

岁”的文章一经发表,各大网站纷纷转载,还引发不少评论:“毛泽东的死对头蒋介石对他的才华能力也是敬佩有加,自愧不如”;“抛开政治的因素,英雄惜英雄,蒋介石高喊‘毛主席万岁’也在情理之中”。也有人认为:“这是蒋介石发自内心的呼喊。尽管他与毛泽东势不两立,但毛泽东光辉的思想、超群的才能、过人的谋略、高尚的人格、宽阔的胸怀、超凡的气度,足以让他为之倾倒,颇有‘不打不成交,不打不相识’的味道。”“蒋介石这既不是作秀,也不是调侃,更不是应酬,是他由衷地呼喊。毛泽东的伟大人格和雄才大略确实让他折服。”也有人认为不可思议。

## 蒋介石6次高呼“毛主席万岁”纯属误读

中央档案馆助理馆员梁琨则认为,蒋介石6次高呼“毛主席万岁”纯属误读!她查实《大公报》1945年10月9日第2版中间位置以《团结商大部协议》为标题,的确刊载有张治中设宴的消息。被邀者除毛泽东、周恩来、王若飞之外,还有“党政军文化新闻各界”。文中不仅没有说蒋介石喊“毛主席万岁”,甚至未提及蒋介石是否出席此次宴会。梁琨进一步查证张治中的回忆文章,其对这次宴会详细描述,但亦未提到蒋介石出席;《毛泽东年谱(1893—1949)》对10月8日毛泽东出席宴会的描述,也没有提到与蒋介石一同赴宴。梁琨据此认定,蒋介石出席这次宴会并

高喊“毛主席万岁”之说纯属子虚乌有。

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、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和红岩革命纪念馆根据档案、书刊材料编的资料集《重庆谈判纪实》,其中详细收录了《新华日报》、《大公报》、《新民报》等多家报纸对毛泽东、蒋介石会谈情况的报道和当事人的回忆等。根据对现有资料的统计分析,重庆谈判期间,毛泽东和蒋介石共会面11次,同时在公众场合出现仅3次,分别是9月4日的庆祝抗战胜利茶会、9月5日的国民党中央干部学校茶会和10月10日的“双十”国庆招待会。这3次公开露面,重庆《新华日报》、《大公报》等仅发了简短消息,会面情形无详细报道。其余8次,都为小范围高层会面,史料记载极为简略。梁琨认为,小范围会面的场合、气氛不适宜喊口号,因此即便没有报道,也可以想见不可能有蒋喊“万岁”之事。由此可以判定,重庆谈判期间,蒋介石6次喊“毛主席万岁”的说法毫无根据。

梁琨还根据更多的资料分析,蒋介石在重庆谈判期间不仅没有喊过“毛主席万岁”,对毛泽东不存在“英雄惜英雄”之情,而是始终表现出既敌视、藐视又忌惮的矛盾心态。梁琨说,处于这种心态之下的蒋介石根本不可能在公开场合高呼“毛主席万岁”。

中国共产党新闻网